



On the Roots of Israeli-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Reason Cause of the-Decision-Making of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论以美特殊关系的根源

以色列总理决策的“理性”成因

李洁宇◎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论以美特殊关系的根源

——以色列总理决策的“理性”成因

On the Roots of Israeli-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Reason Cause of the Decision-Making of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李洁宇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采用微观层次的分析方法,研究影响以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中,以色列历任总理的决策及其成因,以此探寻以美特殊关系的根源。工党、前进党和利库德总理分别受制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旨在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后者坚持“大以色列”信仰,致力于在巴勒斯坦整个地区建立犹太人的国家。本书提出四个假设:工党和前进党总理在处理以美关系时,配合美国的战略或策略。利库德总理的决策分为三类:强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强现实主义把“大以色列”信仰放在首位,但尽量避免损害以美关系;强现实主义者和弱意识形态主义者配合美国战略,必要时摆脱“大以色列”信仰的束缚;强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弱现实主义作决策时坚持“大以色列”信仰,愿意为之付出牺牲以美关系的代价。本书通过大样本统计方法,搜集了从以色列建国至奥尔默特时期的38个案例,证明了假设的合理性。本书预测,工党、前进党和利库德总理在今后的决策中,仍保持既定的倾向,利库德总理将给以美关系带来不稳定因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以美特殊关系的根源:以色列总理决策的“理性”
成因/李洁宇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大国关系研究系列)
ISBN 978-7-313-08168-4

I. 论... II. 李... III. 国际关系史—研究—
以色列、美国 IV. ①D838.29 ②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6066号

论以美特殊关系的根源

——以色列总理决策的“理性”成因

李洁宇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1.5 字数:188千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08168-4/D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4742979

前言

丰富的石油储量、持久的阿以冲突,中东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也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始终不能回避的地区。美国是该地区的主要外来势力,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种特殊关系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其根源在于美以两国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可以说,决策者的理性计算,是推动特殊关系形成的关键。但理性又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分,框定了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作者从以色列角度出发,选定以色列总理这一微观层次,看他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并进而选择如何处理以美关系。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书共分为六章。绪论界定以美特殊关系的内涵,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驱动力,对研究以美特殊关系的中外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本书的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并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设。结语指出,大量经验事实证明了假设的合理性。

第一章是“以色列寻求美国安全保证期(1948~1957年)”。本·古里安在务实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以色列实现了外交政策的

转向,从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到转向亲西方。本·古里安寻觅美国的安全承诺,欲使后者同意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以失败收场。

第二章是“以色列改变美国对其负面印象期(1957~1961年)”。本·古里安在叙利亚和约旦危机中,保持克制,避免阿以冲突升级,显示了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但仍得不到美国的安全承诺。

第三章是“以色列获得美国安全承诺期(1961~1967年)”。本·古里安以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售武政策将破坏阿以均势为由,并不断澄清以色列是西方一员的立场,说服肯尼迪政府对以色列作出安全承诺。本·古里安在1963年的约旦危机中,响应美国要求保持克制,扮演威慑者。艾什科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也顺应美国战略实施自我约束,并防止战争升级。

第四章是“以美关系巩固期(1967~1973年)”。梅厄夫人在尼克松政府满足其售武请求,并公开对以色列作出安全承诺的前提下,接受美国主导的埃以消耗战停火协议。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梅厄夫人避免对埃及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换来尼克松政府关键的军事援助,拯救以色列于危难之中。

第五章是“以美关系稳步和快速发展期(1973~1989年)”。拉宾在得到美国军事援助的基础上,接受埃以脱离接触第二阶段协议。贝京在戴维营会谈中,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既保全了“大以色列”信仰,又顺应了美国时任总统卡特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诉求。沙米尔和佩雷斯在总理任期内,和里根政府在反恐、拯救被真主党劫持的美国人质等方面展开了战略合作。

第六章是“以美关系起伏和调整期(1989年至今)”。海湾战争中,以色列遭遇伊拉克导弹袭击,沙米尔采取自我约束政策,配合美国战略。囿于“大以色列”信仰,沙米尔坚持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使以美关系遇挫。拉宾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与巴勒斯坦签订《奥斯陆协议》,促使以美关系回温。内塔尼亚胡受制于“大以色列”信仰,阻碍中东和平进程,也损害了以美关系。巴拉克接受克林顿关于中东和平的方案,作出了有史以来在巴以问题上最大的让步。沙龙配合小布什反恐战略,接收其“和平路线图”计划,并推出单边

撤离计划,不受“大以色列”信仰之束缚。奥尔默特继续推行单边撤离计划,在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方面配合美国战略。

书中疏漏和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斧正。

李洁宇

2011年12月8日于海口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以色列寻求美国安全保证期(1948~1957年) / 26

第一节 朝鲜战争促使以色列外交政策右转 / 26

第二节 本·古里安支持美国中东地区防御计划 / 29

第三节 本·古里安向艾森豪威尔寻求安全保证 / 33

第二章 以色列改变美国对其负面印象期(1957~1961年) / 38

第一节 本·古里安对艾森豪威尔售武求之不得 / 38

第二节 本·古里安在约旦危机中的自我约束 / 42

第三节 本·古里安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自我约束 / 44

第四节 本·古里安再开绿灯 / 45

第三章 以色列获得美国安全承诺期(1961~1967年) / 51

第一节 本·古里安求得肯尼迪安全承诺 / 51

第二节 本·古里安在约旦危机中再扮威慑者 / 54

第三节 艾什科尔以新均势为名求售武 / 57

第四节 艾什科尔在“六天战争”中的自我约束 / 60

第四章 以美关系巩固期(1967~1973年) / 70

第一节 梅厄夫人接受消耗战停火协议 / 70

第二节 梅厄夫人拯救约旦危机 / 81

第三节 梅厄夫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受制于美国 / 83

第五章 以美关系稳步和快速发展期(1973~1989年) / 93

第一节 拉宾接受第二阶段脱离接触协议 / 93

第二节 贝京在戴维营会谈中的两面手法 / 99

第三节 贝京与里根政府的战略合作 / 104

第四节 沙米尔与里根的战略合作 / 108

第五节 佩雷斯配合里根政府的营救人质计划 / 111

第六章 以美关系起伏和调整期(1989年至今) / 113

第一节 海湾战争中沙米尔和美国的战略合作 / 113

第二节 沙米尔坚持扩建定居点使以美关系遇冷 / 115

第三节 拉宾促和使以美关系回升 / 122

第四节 内塔尼亚胡拒绝贯彻《奥斯陆协议》 / 124

第五节 巴拉克对克林顿建议的配合 / 132

第六节 沙龙配合小布什的战略 / 134

第七节 奥尔默特配合美国战略 / 142

结语 / 155

参考文献 / 168

一、英文文献 / 168

二、中文文献(含译著) / 172

后记 / 173

绪论

以美关系是特殊关系,是举世皆知的事情,人们常用“特殊”两字区分以美关系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但是,何谓“特殊”,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大谈其特殊性,往往只是强化业已存在的现实,却忽略了它的历史发展脉络,没有深刻挖掘导致“特殊性”的根源。研究以美关系,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以美关系的特殊性指什么?

以美关系特殊性的表现是:①两者是非正式盟友,但战略合作关系紧密。②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远大于对其正式盟国的援助^①。③以色列在和美国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没有以牺牲主权为代价。④把两者捆绑在一起的相关威胁,存在时间长,威胁力度大。

一、对“特殊性”根源几种解读的分析

对于这种特殊性根源的不同解读,各有其合理性,也有不合理之处^②,分析如下。

第一,以色列和美国在宗教上同源是两国关系紧密的原因。以色列信仰犹太教,很多以色列总理,如本·古里安、梅纳赫姆·贝京经常阅读《旧约圣经》,

^① Michael Thoma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Israel: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belief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4.

^② Ibid.

沉浸在犹太民族的辉煌历史中,甚至常常借用《旧约圣经》中的词汇,指代现代社会中的通用地名^①。犹太教是另外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来源之一^②,但不能以此推断,三大宗教间密切的渊源能导致相关民族间的天生契合。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关于弥赛亚的诠释有明显不同^③。如果宗教具有特殊功效,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也不会深陷长久冲突无法自拔。更重要的是,宗教本身和政治无关,宗教和政治的混合是人为的结果。

第二,以色列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相似,是以美特殊关系的根源。美国有理想主义传统,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担负着在全球推广民主制度的重任。以色列是中东地区重要的民主国家,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推行民主制度的样板。这种分析从表面上看来具有合理性,但从内里看实则有明显缺陷。以美两国的民主制度多有不同。美国国会可以否决总统提议,总统提议只有在国会通过后才能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意志。以色列议会对外交事务,甚至是特定协议或条约的批准都没有直接影响^④。另外,以色列内阁是总理利用的工具。如果总理以强权压制或将内阁束之高阁,后者也无可奈何。本·古里安时代的内阁就是摆设,他本人并不像表面声称的那样对内阁器重有加^⑤。总理辞职,将带来整个内阁的解体。总理态度强硬,往往能使自己的提议在内阁至少以微弱多数被通过^⑥。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并不能和以色列人享受同等待遇^⑦。

第三,共同的移民背景、拓荒经历和美国人对犹太人的同情,构成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源。以色列建国之前,激励犹太人的是社会主义理想。基布兹以集体劳动的方式而存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载体。所以,如果提到相似性,以色列和苏联的相似性也应该被顾及。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的经历,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犹太人的建国事业博得广泛同情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认为同情是

① [美]吉米·卡特. 保持信心——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M]. 裴克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317.

② [以]阿巴·埃班. 犹太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126、103-104.

③ [以]阿巴·埃班. 犹太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104.

④ Michael Brecher.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 Setting, Images, Proc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27.

⑤ Michael Brecher.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 Setting, Images, Proc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10-413.

⑥ Lily Gardner Feldma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 Germany and Israel*, New York: George Allen & Unwin Publishers Ltd., 1984, p. 81.

⑦ Robert O. Freedman. *Israel in the Begin Er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p. 121.

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援助的根源,夸大了情绪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弱化了国家的理性行为能力。如果美国对以色列抱有超乎异常的同情心,视其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翻版,在以色列最困难的建国初期,它就应该满足以色列提供武器支援的要求。事实并非如此。

第四,以色列和美国相互信任,两国培养起了兄弟式的情谊。信任是一个敏感的字眼。国家之间什么时候能建立相互信任,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观测。双方相信彼此的承诺,可能源于判断失误,并非源于信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夕,以色列时任总理艾什科尔迟迟不发动战争,因为他得到以色列驻美大使阿巴·埃班的电报:美国第6舰队将参加打破蒂朗海峡被封锁状态的行动。埃及大使已得到通知,在埃及进攻以色列的情况下,美国将承担保卫以色列生存权的义务。美国总统警告埃及大使,进攻以色列就意味着埃及的自杀。但在给以色列政府的电报中,美国时任国务卿腊斯克明确澄清:美国没有得到埃及有进攻意图的情报。未经国会批准,美国总统无权对以色列的安全作出承诺。美国总统正谋求组织一支国际舰队去打开海峡封锁^①。另外,很多政治事实带有欺骗性,让人无法识别其内幕,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为它披上了情感的外衣。如,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警告以色列,不要先发制人,如果以色列遭到袭击,美国会进行大力援助。很多人认为,以色列时任总理梅厄夫人对蓄势待发的军队按兵不动,是出于对美国的无条件信任。梅厄夫人在苏联度过悲惨童年,后移居美国获得新生的经历增加了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但实际上,梅厄夫人对战争没有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于捕获的情报不重视,低估了埃及发动战争的能力^②。

第五,游说集团对议员的游说活动是以美关系发展的根源。游说集团财力雄厚,通过奖惩机制为政坛人物提供竞选活动需要的资金,对违背自己意愿的议员甚至总统施加压力。此外,美国犹太人控制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大力宣传两个民族的相似性,动辄便对反以色列人士扣上反犹主义的罪名,塑造了美国民众的观念,削弱了反以色列言论的影响^③。游说活动对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有重要影响,但它并不是以美关系发展的根源,而是在两

① 杨曼苏. 以色列总理拉宾[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65 - 66.

② 杨曼苏. 以色列总理拉宾[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139 - 142.

③ John J. Mearsheimer &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7, pp. 168 - 196.

者关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片段。它不是以美关系发展的起点,而是顺应两者关系发展趋势的产物。它并未开启以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自然也无从终结这段历史。这一点,史蒂芬·M·沃尔特(Steven M. Walt)在《联盟的起源》中也曾剖析过^①。回顾以美关系发展史,“以色列院外集团控制美国”这一观点不攻自破。有“最亲以总统”之称的里根,顶住了以色列院外集团的压力,对沙特阿拉伯出售了先进武器^②。而老布什总统上任之初就把美国的战略重点调整为确保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供应,与以色列关系明显疏远,更因以色列坚持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而对其施加了冻结100亿美元贷款的惩罚^③。

二、本书的创新意义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以上对以美特殊关系根源的解读,在折射出不合理性的同时,又带有合理性。以美特殊关系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是诸多因素发挥合力的结果。学界中人的任务,是选择合适的视角,从一个方面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解释。本书从“理性”角度考察以美关系。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国家生存的关键,双方在彼此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是双边关系“特殊性”的根源。国家利益被定义为某种需要,具有丰富的内涵,必须被置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加以考察。所以,挖掘以美关系的特殊性,必须回到历史中去,考察历史带给以美关系的机遇。

1. 从以色列角度进行选题

国内外关于美国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与美国有关的方方面面都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在分析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时,也是习惯性地从美国入手,考察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这种研究,凸显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弱化了其他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把后者边缘化,仿佛它们在和美国发展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难有作为。而二战后,韩国、日本、德国以“半主权”的代价,换取和美国结盟的经验事实,也加深了世人这一印象。反观以色列外交政策,从中立到转向西方,从频频向美国示好反遭拒绝到让美国主动求援,从单向依赖美国到双方比较对称的合作,其表现出的主动性为这个国家扩展了生存空间。鉴于此,本

① [美] 史蒂芬·沃尔特. 联盟的起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51.

② Michael Thoma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Israel: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belief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56 - 70.

③ Michael Thoma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Israel: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belief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48 - 162.

书试图打破常规,从以色列的视角,考察其在建国以后的不同时期对国家利益的具体判定,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怎样的理性行为。

2. 选定微观层次,将以色列总理作为考察对象

以色列总理是党派的代表,秉承其政党的执政思想。选定总理作为分析对象,在于他的权威性。在以色列的政治体系下,总理拥有最高权威,这是总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后者徒有虚名,而不掌握实权。总理的最高权威还体现在:① 在公开场合下质疑总理的决策,将使其合法性受到怀疑,进而影响到政治体系乃至社会的稳定。② 内阁通过总理的任命而组成,议会中的多数议席由总理所在党的成员占据。③ 总理可以通过撤职等手段,在必要的时刻强行执行决策,以减弱内阁内部的不合作论调。

在特定时期,非总理因素可能在内阁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历史看作是长期的进程而非某个具体的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理在决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本书考察每个总理在与以美关系有关的所有重要事件中的决策。

以色列是联盟政府,内阁成员来自不同党派,这增加了他们产生分歧的可能性。以色列每一个部长都可以提议申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外交政策问题。为避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笔者考虑两种情况:在内阁无较大分歧时,总理决策易被认可;在内阁分歧较大的情况下,总理坚持主观利益判断,采取强硬措施推动内阁达成决议,使自己的决策被通过。

3. 提出主观利益的概念

权力界定利益的含义是,国家根据权力的大小,在国际体系中各安天命,循规蹈矩^①。这种“物质决定论”的论调夸大了权力等物质因素在国家利益界定中的作用,却忽略了个体行为体,即政治家在判定国家利益、决断国家行为时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观念决定利益,是个夸大了人的高等身份的命题。人的理性行为能力使其趋利避害的本能得以充分发挥。总之,把利益单纯地看成是由权力或观念界定的,都是有失偏颇的表现。

本书摒弃结构决定论,从内在因素出发,采取微观层次进行分析,考察以色

① “权力界定利益”是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之一,华尔兹曾有过专门分析。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汤普森,戴维·克林顿.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9.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98 - 199.

列总理如何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即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长期性战略和机动性策略,也就是说,应该采取中立还是结盟的战略,和谁结盟,如何结盟,为了实现结盟应该舍弃什么等。这体现了行为体个体对国家利益的认知状况。可见,本书讲的国家利益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它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可被称为主观利益。主观利益的提出,体现了政治家的主观能动性对国家间关系的建设或破坏性作用。

4. 本书把国家利益从抽象还原为具体概念

国家利益是抽象的概念。学者在分析决策原因时,经常笼统地提及国家利益,似乎所有国家行为都受国家利益这只无形之手的幕后操纵。久而久之,国家利益成为空洞的概念,是解释一切国家行为的万灵丹。本书研究特定环境下的总理决策,把主观决策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赋予国家利益具体实在的内容。

5. 注重史论结合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围绕“主观利益”搭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于预设一条主干,统筹回顾以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重在叙事和分析。叙事是简明扼要地叙事,沿着总理的决策即主观利益铺陈展开,而不涉及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鉴于时间跨度大,以美关系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每阶段由若干标志性事件构成。即使有主干,若不进行及时的总结性分析,也会给人以杂乱之感。因此,本书采取统计方法,用详尽的资料凸显清晰的主干,用提纲挈领式的主干及时整合资料,使其多而不散。这种史论结合,重在写史,兼而讲究方法的论文设计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分析法。

本书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积极寻求变化,调整中东政策,试图改变美国留给世人的过于偏袒以色列的印象。奥巴马对伊斯兰世界频频示好,宣扬伊斯兰文明丰富了美国的文化,更公开承认自己是穆斯林。对伊朗,美国政府也一改以往过于强硬的态度,坚持和伊朗政府进行谈判,让其参与国际社会进程并承担责任。

2011年,美国对伊朗的态度重新转为强硬。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10月15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施压,要求其公开伊朗制造核武器的机密情报资料,以证明伊朗核计划就是以制造核武器为目的。2011年11月8日晚,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奥地利维也纳公布了最新的伊朗核问题报告,称有“可靠”迹象证明,至少在2010年以前,伊朗拥有发展核武器装置计划并进

行了尝试,而有关“研究核武器”的活动现在很有可能仍在进行^①。至2012年1月26日,由于伊朗拒绝停止铀浓缩活动,联合国安理会已对伊朗实施四轮制裁。此外,欧盟和美国还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1月24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称,美国决心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但同时表示,以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依然是可能的^②。

以色列现任总理是著名鹰派人物内塔尼亚胡。面对奥巴马政府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宣言,他在撤军问题上的态度明显和美国现行政策背道而驰。内塔尼亚胡来自隶属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利库德集团。该党派素以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来凝聚党内的认同感,并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这无疑为以美关系蒙上了阴影。但以美关系的发展也存在有利因素。以色列继续强调来自伊朗的威胁,打“伊朗牌”。2011年10月底,在以色列议会冬季会期开幕的政策演讲中,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一个核武器的伊朗将对以色列乃至全世界构成严重威胁。11月3日,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表示,解决伊朗问题的时间所剩无几,外交解决的空间已越来越小,采取军事途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③。

中国进口的石油不仅约一半来自中东地区,而且主要是租借别国油船通过海上长途运输到国内的,其中须经过多个美国控制或影响下的海上石油运输“咽喉口”,如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④。美国的中东政策关乎该地区的稳定,也直接影响中国的石油安全。正视以美关系的特殊性,挖掘其内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梳理以美关系的发展史,进而预测其发展趋向,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精确的预测不是本书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大体估计以美关系是否有大的波动,哪个党派上台执掌以色列政坛对以美关系更有利,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三、对现有研究以美关系文献的考察

(一) 直接相关文献

从国家利益角度考察以美关系的文献,多是采用历史分析法,把以美关系看

① 高永泽. 伊朗核危机的临界点[J]. 中国新闻周刊, 2011(43): 48-49.

② 伊朗称奥巴马对伊言论是“政治宣传”. 参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1/c_111461648.htm.

③ 高永泽. 伊朗核危机的临界点[J]. 中国新闻周刊, 2011(43): 48-49.

④ 舒先林. 美国的中东石油战略与中国能源安全[J]. 西亚非洲, 2010(2): 10.

作无法复制的个案,力求充分挖掘影响以美关系发展的全方位因素。无论是从美国还是从以色列角度入手的文献,或专注于某个或几个特殊的阶段,或试图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从所有领域寻找两者关系发展的原因的研究,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为世人了解以美关系的历史及现状进而预测其未来,提供了不同侧面。

第一类是考察以色列特定群体对以美关系影响的文献。

科林·辛德勒(Colin Shindler)的《以色列、利库德和犹太复国主义梦想——从贝京到内塔尼亚胡的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①(*Israel, Likud, and the Zionist Dream: Pow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from Begin to Netanyahu*),分析了贝京在率领利库德集团成为以色列的执政党后,如何和其他利库德总理为实现“大以色列”信仰努力。与美国有关的内容是:在戴维营和会上,贝京没有对西岸作任何具体的承诺,卡特没有逼迫贝京停止在西岸和加沙修建定居点的活动,贝京在和会后公开声明冻结定居点只适用于西奈半岛。舒尔茨关于巴以会谈和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遭到了沙米尔的抨击,后者扬言联合国242号决议不适用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约旦代表团的会谈,以色列以通过撤离西奈半岛的方式履行了该协议。贝克抨击“大以色列”计划,沙米尔对贝克关于中东和平的五点计划不置可否。沙米尔参加马德里会谈但在会上重施推诿搪塞之故伎,在定居点问题上态度强硬,使以美关系滑至低谷。

第二类是传记、自传类文献。

以色列历届总理的自传,如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持久的和平》^②、梅厄夫人《我的一生》^③(*My Life*)、伊扎克·拉宾《拉宾回忆录》^④(*Rabin Memoirs*),他传如迈克尔·巴·佐哈(Michael Bar-Zohar)的《西蒙·佩雷斯》^⑤(*Simon Peres*),叙述了这些总理的生平,自然而然地介绍了其在总理任期内,对以美关系重大事件的处理,让读者对此有更细致的了解。

第三类是考察特定因素对以美关系影响的文献。

① Colin Shindler. *Israel, Likud, and the Zionist Dream: Pow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from Begin to Netanyahu*, London: I. B. Tauris, 1995.

② [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持久的和平[M]. 田在玮, 莎文.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③ Golda Meir. *My lif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5.

④ Yitzhak Rabin. *The Rabin Memoi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97.

⑤ Michael Bar-Zohar. *Shimon Peres: The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亚伯拉罕·本·兹维(Abraham Ben-Zvi) 的《美以同盟的根源——约旦因素》^①(*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Israel Alliance: The Jordanian Factor*), 从约旦角度分析了美以关系的发展动力, 分析了 1957、1958、1963、1970 年的约旦危机中, 美国政府利用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施加威慑, 防止以色列采取单边军事行动, 从而最终化解危机的做法。以色列配合美国战略的表现凸显了自身的战略价值, 加固了美国在约旦危机中的行为模式。

加利亚·戈兰(Galia Golan) 的《从奥斯陆到单边撤离计划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②(*Israel and Palestine: Peace Plan from Oslo to Disengagement*), 介绍了 1993 年《奥斯陆协议》、2000 年戴维营和会、和平路线图、单边撤离计划等一系列以缔造阿以和平为目的的国际安排的背景及详细内容, 以及它们对以美关系的影响。这些条约或协议都由美国提议或参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对美国的态度差异, 工党总理拉宾、巴拉克和利库德总理沙龙尤其是内塔尼亚胡对美国态度的差异, 反射了以美特殊关系, 以及以色列两大政党对美国战略的不同反应。

第四类是考察以色列如何寻求良性以美关系的文献。

扎克·莱维(Zach Levey) 的《以色列和西方强国》^③(*Israel and the Western Powers*) 记叙了 1952 ~ 1960 年期间以色列寻求英美法德四国武器供应的过程。苏伊士运河危机后, 各边境相对都比较安宁的以色列进入了安全领域的黄金时期, 但本·古里安仍担忧安全问题。他把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武器供应看作是严重威胁, 认为法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随时有中断之虞。1958 年, 以色列允许美英两国飞机飞越其领空, 并在此期间加大寻求美国安全保障的力度。1957 ~ 1958 年约旦、黎巴嫩、伊拉克的动乱没有带来以美战略关系, 但美英不再把以色列看作战略障碍。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 以色列都表示愿和美国签订没有约束力的条约, 以保证自己在所有外交和安全事务中的自由。50 年代后期, 以色列外交政策表现为以法国和德国为基础的欧洲转向, 并把以德关系作为获取美国武器的加速器。

尤里·布莱勒(Uri Blaler) 的《在东方和西方之间: 以色列在 1948 ~ 1956 年

① Abraham Ben-Zvi.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Israel Alliance: The Jordanian Facto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② Galia Golan. *Israel and Palestine: Peace Plan from Oslo to Disengagement*,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7.

③ Zach Levey. *Israel and the Western Powers, 1952 - 196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